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Inc.
美國學術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1 (2018)

ISSN 2833-1516, Online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15
吳漠汀 (M. Woesler) 主编

歐洲大學出版社

漢學

漢學 Sinology 1 (2018)

《漢學》由世界漢學研究會(http://china-studies.com)於2018年創辦，收錄有關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大中華地區歷史、經濟、文化和社會文章、不定期論文、評論文章、書評等，以及其他中文期刊和專著的論文摘要。本期刊為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專門的學術交流論壇。我們歡迎各地學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的來稿。
Hanxue / Sinology is a double blind peer reviewed annual journal in Chinese on tradition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Letters, Philosophy, History, Law, Economy etc. It offers a forum especially for scholars from sinophone countr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PhD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Publisher: New Castle: 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Editor: Martin Woesler.
《漢學》文章經過專家審閱，每年出版一期。
期刊網站是：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本刊已加入以下引文索引： Publons、Index Copernicus、ROAD、Citefactor、Academic Research Index (ResearchBib)、Scientific Indexing Service 等
《漢學》是中國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中文學術期刊。編輯部：湖南師大外院國際漢學中心。
出版社、印刷、發行：美國學術出版社，美國19801特拉華州紐卡斯爾縣威爾明頓市 1007 N Orange St 4th floor suite #96,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美國：該雜志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印刷出版，可通過ap@e-texts.org或亞馬遜網站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歐洲：該期刊由歐洲大學出版社在歐洲印刷和出版，可以通過 info@universitypress.eu 或 Amazon.de 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主編：吳漢汀
郵箱: journal@china-studies.com
ISSN 2833-1516, Online ISSN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1-5, ASIN
每篇文章都有 DOI, 例如：DOI:10.12906/978168202 5215_00X, X 表示期刊的部分，比如 X 是 1 表示封面、版權頁、目錄，2 表示第一篇文章。3 表示第二篇文章，以此類推。訂購 order@china-studies.com
製作編輯：黃淵基，漢學編輯：朱立蕾
個人和機構訂閱費用（含國內外郵寄費）：
紙質版 49 歐元/年（不含特刊）
電子和紙質版 99 歐元/年（含特刊）
特刊 49 歐元/期
大學校內網入口許可 (IP 域名範圍)398 歐元
有關每期目錄信息，請參閱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記錄：
http://journal.china-studies.com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來稿須知
請在 Microsoft Word 或 Open Office 中按照期刊的格式編寫論文，並提交至 journal@china-studies.com。

《漢學》期刊投稿文章格式詳述：

1. 字體和行距

文章應選用 A5 版面，頁邊距為上下左右各2cm。文章標題中文應採用 20 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 20 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副標題中文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四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作者名字，所在大學，所在國家或地區這一資訊應採用五號宋體，並居中顯示。

文章摘要部分："摘要"二字應採用五號加粗宋體，左對齊，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宋體，寫在"摘要："二字下一行，中文摘要需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中，"Abstract" 這一單詞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左對齊，英文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寫在"Abstract:"下一行，英文摘要需 250 詞左右。

正文部分：一級標題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二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加粗宋體，上方空一行，三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宋體，其他正文內容中，中文應採用小四號宋體，英文應採用小四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首行縮進 2 字符，行距統一為：多倍行距 1.2 倍。註腳部分：中文應採用五號宋體，英文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文中引文以及註腳

當正文中出現長引文時，應單獨引用，採用五號楷體，前後空出一段，每行縮進 4 字符。在引文最後應當用括弧標明作者名字，年份及頁碼，不同項間用英文逗號以及英文空格銜接。

請將作者相關研究方向，聯繫方式，是否為基金專案論文等資訊作為註腳於封面頁標明，如論文為基金專案下論文，請按照"基金專案：專案名稱或編號"格式在註腳寫明，註腳部分只需要注明需要解釋的信息，無需將參考文獻添加在註腳部分。

3.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四字應另起一頁，採用四號宋體，左對齊顯示，文獻按照英文首字母或拼音首字母排序，書籍以及期刊名應用斜體表示。參考文獻第一行左對齊，第二行應首字縮進 2 字符。

引用文獻為**書籍**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書籍名* [英文翻譯]. 出版地[英文翻譯]：出版社[英文翻譯].

英文的書籍：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Book Title* [中文翻譯]. Place[中文翻譯]: Publishing House[中文翻譯].

引用文獻為**期刊**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文章名稱[英文翻譯]. *期刊名稱*[英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英文的期刊：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Paper Title [中文翻譯]. *Journal title* [中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倫理聲明

《倫理聲明》基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於 2011 年起草的建議。**編輯義務**

1. 中立。文章內容與作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殘疾、宗教、民族、政治哲學無關。
2. 保密。所有手稿都應被視為機密文件。未經編輯允許，不得將它們展示給任何人。除了作者、審稿人之外，管理人員和編輯人員不應向任何人透露提交的稿件信息。
3.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未經作者明確同意，編輯或審稿人不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所提交稿件中未發表的數據。
4. 發表決定權。期刊編輯決定投稿文章的發表。編輯在編輯委員會政策的指導下，考慮有關誹謗、版權和剽竊的法律義務。編輯可以與編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審稿人共同做出決定。如果作者對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編輯可以邀請兩位新的審稿人。

審稿人義務

1. 編輯權。審稿人協助編輯人員做出決定，也可能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
2. 延期和最後期限。當一名客座審稿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估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或者如果他發現自己無法及時提供報告，必須立即通知編輯，以便預留時間聯繫其他審稿人。
3. 客觀、禮貌和尊重的標準。報告必須客觀。不允許針對作者的個人評論和批評或針對文本內容的傷害性言論。審稿人的觀點必須清晰，論據充分，並且尊重作者。
4. 引用文獻。審稿人必須找出作者未引用的出版物。任何此類表示都必須附有適當的評論。審稿人應提請編輯注意手稿和以前發表的數據之間的任何相似性和重疊。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通過匿名回復獲得的信息和想法是機密的，不應用於審稿人的個人利益。審稿人不應接受可能導致與作者產生競爭、合作或其他關係的利益衝突的稿件。

作者的義務

1. 信息的有效性。在提交出版的文章中包含的信息必須提出作者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及其重要性的客觀討論。基礎數據必須正確顯示。欺詐性和故意不准確的信息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作者應該引用對研究有影響的出版物。
2. 創意和剽竊。作者必須確保所寫的是自己完全原創的研究，如果他們使用了其他人的書或文章，必須適當地標記出引用出處。
3. 一稿多投。作者不應向多個期刊(或書籍)提交同一篇稿件。在多個期刊上提交同一篇稿件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本雜志不接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表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必須提供第一次出版的參考資料，並且不受原出版商的版權限制。
4. 文章作者。只有對相關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作者才被認為是作者。所有對研究做出貢獻的人必須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如果其他人參與了這個研究項目的某些方面，他們應在致謝中提到。第一作者必須確保所有合作作者(且只有合作作者)都包含在稿件作者名單中，合作作者已經看到並批准稿件的最終版本，且同意提交稿件。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所有作者如果有基金支持，必須標明。
6. 出版中的錯誤。如果作者在其出版物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或不准確之處，必須迅速通知編輯。

漢學 1(2018)7-22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1

《漢學》第一卷（2018）
中西文化研究

內容目錄 Contents

晚清海外旅行诗文中的伦敦形象————陳室如..... 7
The image of London in the travel notes and poems of overseas travel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2

“我们错了”——汉学应对主流叙事传统————吴漠汀 31
“We were wrong”——Coming to terms with failed master narratives of Chinese Studies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3

贝克特《庸女梦》中的中国音乐：改写与误读————曹 波.43
Chinese Music in Beckett's 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Rewriting and Misreading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4

從「父母國」出走——安琪詩中的空間經驗與女性主體建構——
——洪淑苓 69
Running Away from Parents' Hometown：Space Experience & Femal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An Qi's Poetry
DOI:10.12906/9781682025215_005

漢學 1(2018)31-48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3

“我们错了”——
汉学应对主流叙事传统

“We were wrong” – Coming to terms with failed master narratives of Chinese Studies

吴漠汀，湖南师范大学，中国
Martin Woesl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摘要

作为国际汉学研究者，我们想对中国的两个主要误解道歉。第一，耶稣会士和其他人试图在古代中国文本中证明西方基督教之神存在的主要叙述。他们将其作为一种工具，通过操纵翻译来歪曲中文文本。第二，中国停滞的主要叙述经常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时被称为固有的和系统性的。在 1830 年至 1980 年间，这种叙述是一种教条。自 1978 年以来，破坏性经济发展证明了这种叙事错误，而儒家思想被视为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叙事是成功的共产主义改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汉学家放弃了中立，距离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在宣传的基础上，热烈地

庆祝文化大革命，成为毛泽东的忠实粉丝，举起红宝书。相信中国宣传的意愿一部分是出于将中国理想化为一种模式的愿望，这种模式可以为西方社会的改革指明方向。

关键词

道歉；错误；误解；操纵；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大师叙事；中国研究；汉学；接受过去

Abstract

We,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Chinese Studies, apologize for two main misinterpretations of China. 1.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Jesuits and others who tried to proof the Western Christian god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As a tool, they used a distortion of the Chinese texts by manipulated translation. 2.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the stagnation of China, sometimes claimed to be inherent and systemic, often reasoned with Confucianism. This narrative was a dogma for 150 years between 1830 and 1980. The disrup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78 has proven this narrative wrong, Confucianism is seen as one reason for the economic miracle. 3.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successful Communist reform. During the 1970s, Western sinologists abandoned basic principles of neutrality, distance and fact-seeking and, based on propaganda, enthusiastically celebra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came dedicated followers of Mao Zedong, holding up the Little Red Book. The readiness to believe in the Chinese propaganda was partly motivated by the wish to idealize China into a model which could show the way for a reform of Western societies.

一、上帝在中国

人类发展出对祖先的崇拜，这与自然宗教相辅相成。自然宗教建立了一层解释自然神意愿的萨满。在印度，吠陀宗教的祭司阶层与人民疏离，因为吠陀宗教的宗教文本

对语言产生了保守的影响，文本被定为经典，最终普通人无法理解。最终，只有吠陀祭司才能理解吠陀文本。这是所谓“反宗教”启蒙佛教的开始。由于人民与宗教文本及其祭司的疏离，佛陀得以建立佛教。他宣称每个个体都能找到自己的自我认知和精神解放之路（涅槃）。尽管佛陀没有摒弃祭司，但他建立了新的传统，即导师将有他们的弟子，这些弟子可以超越他们的导师。此外，佛陀通过宣称不完美人的生活更加有趣，破坏了全能神的完美主义观念。

在中国，时至今日，祖先崇拜也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深厚的传统。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萨满的时代，但几千年来，每个家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祖先崇拜传统。人们相信天上的祖先能够守护并影响着他们在地球上的后代的生活。因此，家族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即便是统治者，也会使用火炮以及刻在龟壳或牛骨上的文字来与祖先交流，并通过预测未来以寻求指引。然而，随着朝代更迭和新的族群接管，人们不能再声称祖先是他们的亲戚。这导致了上帝（Shangdi）的概念逐渐被天（Tian）所取代，伴随而来的理解如“天子”、“天命”等为统治者提供了合法性。尽管存在神话中的神灵，但与欧洲和埃及一样，中国对神的理解并没有像那些地区那样发展得那么具体和权威。埃及和欧洲都经历了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演变。一神教不仅确立了祭司的地位，充当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而且由于不受控制的权力常常被滥用，这些中介者获取了世俗财富，并通过对劳动力的滥用甚至性滥用来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在欧洲，权力分散在统治者和教会之间，由教皇、红衣主教、主教和神父代表。

由于宗教通常宣称具有普世价值，所以当东亚和非洲

发现新的领土时，传教士试图通过强迫当地人接受欧洲宗教以及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等社会发展模式来扩张他们控制的领土。当第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并发现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对双方都是积极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种另外的动机，即在现在互动的基础上，传教士们对继续保持积极的交往产生了动力。由于基督教是在神圣文本中揭示的一种宗教，传教士有强烈的动机在中国古典文本中寻找证据，证明基督教上帝在中国也存在。因此，在他们最早翻译的文本中，他们选择、翻译和整理了经典文本。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道德经》，他们以扭曲的方式翻译，以证明基督教上帝在中国也存在。

这是第一个重大错误，即欧洲人试图在中国的根源中找到他们欧洲上帝的证据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在翻译时原文本的内涵和思想被强行改变为欧洲视阈下的理解。例如《道德经》的翻译最初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在内部进行讨论。原因在于，讨论的结果是，翻译中的偏差可能过大，最终在古代中国文本中找不到基督教上帝的证据。尽管如此，自那时以来，一些传教士、神父（如理查德·威廉姆斯）和汉学家（如沃尔夫冈·库宾）仍倾向于将中国对“天”概念翻译成欧洲人熟悉的“神”等概念。这是错误的，作为汉学家，我们为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向中国公民道歉。我们希望通过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来纠正这个历史性的错误。

所有的体制化都会产生惯性，中国社会非常体制化，因此总体而言，基督教化失败了。然而，传教的次要目标，即传播欧洲社会发展的理念方面取得了成功（经济、健康、教育的发展，带来进步和现代化）。传教士将欧洲的知识书籍翻译成中文，因此实际上进行了知识转移。同时，对外语的学习也得到了提升。

在历史长河中，威权统治被民主政体所取代。在欧洲历史中，教会的权力也受到了新教改革主义的制约。在中国，1912 年建立中华民国同样也发生过。不同宗教在对待信奉不同宗教或无神论者的态度上更或多或少是宽容的。伊斯兰教平均而言对其他宗教的容忍度较低于基督教。两千年来，欧洲一直由基督教主导，而中国主要由祖先崇拜主导，对佛教、道教和其他形式的宗教也有着很大的宽容。

二、 停滞的中国

国际上关注中国的学者往往在理想化中国（中国风情画）和妖魔化中国（停滞、黄祸）之间不断切换。

长期以来，西方汉学界一直将中国的“停滞”视为“别无选择”和“由儒家主义引起”。然而，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展现出了颠覆性的经济发展，证明了这种说法的错误。现在，西方汉学家也用儒家主义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西方汉学界必须承认其历史错误，必须克服“停滞”这一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教条，与中国同行的交流，如在这次大会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从崇拜中国到妖魔化中国的骤变认知，也包括了黑格尔，他也将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尽管他找到了证据表明孔子发明了黄金法则，但他将中国描述为通往“世界精神”（Weltgeist）的阶梯的最低一层，而柏林则在顶端。他对中国的谴责被马克思继承并同样加以谴责。

有几种叙述表明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一种巨大分歧，或者主张在这一阶段存在一些小的分歧。然而，对西方知识书籍的古代汉译的新发现以及糖消费的新统计（中国的糖消费在大多数时间都高于欧洲）今天对这些叙述提出了质疑。

三、 红卫兵式的西方汉学家

每当科学和学术沦为意识形态或宗教滥用的工具时，就失去了其客观性，甚至会背弃科学和学术的基本原则，例如进行独立研究而没有预设结果，并接受无论结果如何。

汉学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学者是研究中国主题的学者。为了保持合理的视角研究中国，他们能够自由地前往和离开中国，以能够改变视角并保持距离。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当西方资本主义和体制受到挑战，主要是由越南战争的图片引发，这些揭示了战争的残酷，美国士兵在越南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等残暴的手段，儿童赤身裸体被空袭吓的四处奔逃等诸如此类的照片改变了欧美世界对体制化资本主义的态度。突然之间，那些被确信是“好人”的人开始质疑自己是否是“坏人”，并认为必须改变他们的体制以实现和平共处。

全球范围内的西方汉学家也轻信了成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例如，在 1961 年，德国记者卡尔·施密特在他的著作《游击战的理论》[1]中声称毛的游击部队是能够挑战战后官僚世界秩序的唯一方式。德国汉学家约阿希姆·希克尔在 1970 年赞扬他是“唯一可以接触的作者”。[2]同样也是 1961 年，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指示《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的一句话。这些说法在主题上分类后，于 1964 年首次出版。带有毛泽东格言的《红宝书》在中国印刷了超过 7.4 亿册，以供每位公民拥有一本。在其最流行的时期，

[1] Carl Schmitt 卡尔-施米特. *Theorie des Partisanen. Zwischenbemerkung zum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党派理论。关于政治概念的临时评论》. 柏林 Berlin: Duncker & Humblot，1963 年。

[2] Joachim Schickel, *Gespräche mit Carl Schmitt*. 柏林：Merve-Verlag，1993 年，第 9 页。

即 1966 年至 1971 年，它是印刷量最大的书籍，以 30 多种语言印刷，并传播到 100 多个国家，超过 10 亿次。自 1966 年以来，《红宝书》在德国外语出版社还提供德语翻译。[3] 让·吕克·戈达尔于 1967 年 8 月发布了他的电影《中国姑娘》，展示了巴黎的毛主义者团体。这导致了该意识形态在西方汉学家中的流行。

最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集，[4]记录了西方汉学家和年轻知识分子在 1960-70 年代如何接受和拥抱毛主义。其中，塞巴斯蒂安·格里格记录了在 1960 年代德国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中对毛泽东的正面评价。[5]

在 1965 年，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创办了期刊《課本》（Kursbuch），几乎该刊一经发行，便成为了 1960 年代后期的左翼派主要期刊。[6]该刊一直把中国作为主要关注点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该杂志的第二期中强调“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政治”。[7]扬·默达尔在第六和第二十三期发表的两篇题为“中国农村报告”的文章旨在展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农民的巨大利益。[8]第十

---

[3] Dominic Sachsenmeier, “Little Red Book,” "红宝书",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词典》, Akira Iriye 和 Pierre-Yves Saunier 编辑。Houndsmill: Palgrave-MacMillan 2010, pp. 686-687.

[4]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毛泽东的小红书：全球史》, Alexander C Cook 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299 页，2014 年 3 月 6 日。

[5] https://heiup.uni-heidelberg.de/journals/index.php/transcultural/article/view/9072/3106.

[6] Henning Marmulla, “Das Kursbuch. Nationale Zeitschrift, internationale Kommunikation, transnationale Öffentlichkeit,” 课本。国家报刊、国际通讯、跨国工作. *Handbuch 1968. Zur Kultur- und Mediengeschichte der Studentenbewegung*, ed. Martin Klimke and Joachim Scharloth (Stuttgart: J.B. Metzler, 2007), 37-47.

[7] Joan Robinson 琼-罗宾逊. “Von China aus gesehen”《从中国看世界》, *Kursbuch* 2 (1965): 83-102。

[8] Jan Myrdal，"Erzählungen aus einem chinesischen Dorf，" *Kursbuch* 6 (1966)：40-72；Jan Myrdal，"Erzählungen aus einem chinesischen Dorf，" *Kursbuch* 23 (1971)：145-65。 另见：Jan Myrdal，《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纽约：Random House，1965 年）。

六期中，彼得·施耐德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具备能够摧毁主导西方的“文化产业”的潜力。[9]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埃杜尔达·马西试图解释文化大革命对传统中国家庭造成的变化。在一篇长达八十五页的文章中，约阿希姆·席克尔宣称中国和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继承者。[10]他描述了毛的几个方面，从而创造出后来特别吸引年轻左翼活动家的形象[11]。[12]通过强调毛在政治、游击战、诗歌和哲学领域的才华，席克尔的言论成功地吸引了当时正在壮大的左翼基层团体。[13]许多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纷纷采纳了毛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寻求建立新的“真正革命党”的活动家，后来被称为所谓的K-Gruppen（K组织，K是Kursbuch的缩写），[14]以及激进的活动家和恐怖分子。在第二十四期中，席克尔赞扬了在毛的

---

[9] Peter Schneider，"Die Phantasie im Spätkapitalismus und die Kulturrevolution，" Kursbuch 16 (1969): 1-37。

[10] Joachim Schickel 约阿希姆-施克尔，《中国的辩证法。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Kursbuch 9 (1967): 45-129。

[11] 在本文中，我所指的"形象"一词是 Kathrin Fahlenbrach 在阐述社会运动的抗议活动时所下的定义。参见 Kathrin Fahlenbrach, Protestinszenierungen. Visu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en in Protestbewegungen (Wiesbaden: Westdt. Verlag, 2002), 160.

[12] Cf. Laura K. Diehl, "Die Konjunktur von Mao-Images in der bundesdeutschen ‘68er’-Bewegung," in Kulturrevolution als Vorbild? Maoisme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ed. Sebastian Gehrig, Barbara Mittler, and Felix Wemheuer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8), 179-201.

[13] Sebastian Gehrig，"划清敌我界限"。“Zwischen uns und dem Feind einen klaren Trennungsstrich ziehen. Linksterroristische Gruppen und maoistische Ideolog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1960er und 1970er Jahre," in Kulturrevolution als Vorbild? Maoisme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ed. Sebastian Gehrig, Barbara Mittler, Felix Wemheuer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8), 153-77; Sebastian Gehrig, "Sympathising Subcultures? The Milieus of West German Terrorism,” 西德恐怖主义的背景，*Between Prague Spring and French May: Opposition and Revolt in Europe, 1960–1980*《布拉格之春与法国五月：1960-1980 年欧洲的反对派与叛乱》，Martin Klimke, Joachim Scharloth, and Jacco Pekelder 马丁-克林克、约阿希姆-沙洛特和雅科-佩克尔德编（纽约/牛津：Berghahn Books，2011 年），233-250 页。

[14] Andreas Kühn, *Stalins Enkel, Maos Söhne. Die Lebenswelt der K-Grupp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70er Jahre* 斯大林的孙子，毛泽东的儿子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5), 111-114.

“实践至上”的指导下进行的“群众自我教育”，将其视为革命教育的最终改进。[15]席克尔还翻译并评论了毛的一些重要著作集。作为一位游记出版商，他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目击者，因此在知识分子和亚文化的左翼公众中获得了可信度。[16]

约阿希姆·希克尔在德国对毛泽东的正面评价也得到了记录。

约翰·格雷在书评[17]中总结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对于非德国的欧洲汉学家，我在这里主要遵循他的摘要。他描述了法国思想家对这部电影的接受方式：

[朱利安] 布尔格：“毛的暴力语言有一定的修辞吸引力。”事实上，正是他将修辞暴力与次黑格尔辩证逻辑相结合，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某些部分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赞美毛区分主次矛盾的能力，路易斯·阿尔都塞将毛主义范畴用作对“理论的相对自主性”的极度抽象的，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无意义的辩护的一部分。

阿尔都塞的学生阿兰·巴迪乌（多年来一直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教授）在毛主义变得不可忽视的规模之后仍然继续捍卫毛泽东的思想。早在 2008 年，他为自己“现

[15] Joachim Schickel 约阿希姆-施克尔. “China 1970: Die Selbsterziehung der Massen oder Die Pädagogik revolutionieren” 1970 年的中国 *Kursbuch* 24 (1971): 181-98.

[16] Joachim Schickel 约阿希姆-施克尔. *Die Mobilisierung der Massen. Chinas ununterbrochene Revolution*《群众的动员》。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慕尼黑：List，1971 年）； Joachim Schickel 约阿希姆-施克尔 *China in der Welt. Ein außenpolitisches Dosier*《世界中的中国》 (Munich: Hanser, 1973); Joachim Schickel, Große Mauer, große Methode. Annäherungen an China (Klett: Stuttgart, 1968); Joachim Schickel (ed.), Guerilleros, Partisanen. Theorie und Praxis 理论与实践 （慕尼黑：Hanser，1970 年）。

[17] Gray, John. “How the West embraced Chairman Mao’s Little Red Book” 西方如何接受毛主席的小红书》。*The Statesman* 政治家（2014 年 5 月 23 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2014/05/how-west-embraced-chairman-mao-s-little-red-book.

在是毛泽东思想的为数不多的值得一提的代表之一”而自夸，赞扬毛的思想是“否定否定的新政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立场仅仅是可鄙的 - 在巨大的尸体堆周围的教授般的旋转。但必须记住法国左翼一些人的无尽轻率。早在 1980 年，两位前毛主义激进分子就以时尚的语言宣布了他们对信仰的拒绝：“中国在内...现在没有...我们不再是毛派。”在这个背景下，巴迪乌的坚持几乎是英勇而荒谬的。

多米尼克·柯奇纳·瑞尔则记录了毛主义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影响更广泛：“在意大利，毛主义热潮并不纯粹是左翼现象。一些极右翼组织引用《红宝书》来证明他们的论点。”在 1968-1973 年间，新法西斯党赞扬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坚决反对者。在脚注中，他观察到“意大利的纳粹毛主义运动包括许多其他人物和团体”除了 Lotto di Popolo 之外。

格雷抱怨：“遗憾的是毛的这种影响方面没有更详细的探讨。”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毛主义汉学家的这一代后来成为他们自己历史的记录者，汉学家的历史，但他们从未与之和解，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对德国“红军阵线”怀有同情的活动分子后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政府的部长，不愿被提醒他们的过去一样。

格雷在他的书评中还写道：“在一篇纲领性的引言性文章中，亚历山大·C·库克将中国领导人的书比作“精神原子弹”，并考虑了它的全球影响。安德鲁·F·琼斯展示了它如何反映了 19 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引入中国的唱诗班的影响，提供了对毛泽东流行歌曲崛起的启发性描述。在以全球分发《红宝书》的起点为出发点，徐兰军在毛主义对全球革命的观念背景下研究了翻译过程。奎恩·斯洛博迪安讨论了该书在东德和西德的影响。在结束性的论文中，王班考虑了《红宝书》在中国的“宗教与政治”影响。在其他地方，

讨论了它在坦桑尼亚、印度、秘鲁、阿尔巴尼亚和前苏联的影响。”“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西德，《红宝书》“同时类似于经典工人运动的附件，也是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时髦商品”。在剧院里，刷新处的对面有玻璃柜，“摆满了漂亮的红色毛圣经（每本两德马克）”。作为一种反消费主义的商品，该书成为“商业市场中社会区别的标志”。“因为被指责扭曲毛的思想并产生“广泛而有害的影响”，该书于 1979 年 2 月撤回发行，一亿本被销毁。”

当中国政府这一政治体制在西方备受欢迎的时候，在国内其实是一场导致大量人民受害的政治行动。

今天，文化大革命也被评价为“10 年动乱”。毛泽东动员群众进行无休止的革命的方法被证明是历史上的失败。

然而，如今仍有一些科学和学术研究可能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而不是专注于客观的研究目标。

自由的本质是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存在。然而，面对历史中的一个新问题，即何时应对大规模杀人犯采取致命手段，我们陷入了困境。当共产主义威胁要以数百万人的生命奴役整个人口时，干预的合理程度成为一个深刻的考虑。然而，当不仅仅是一个大规模杀人犯，而是一个被领导误导的整个群体，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层时，我们如何明确区分善与恶？现实往往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灰色，这意味着道德判断可能并不总是清晰而绝对。